

东德剧变亲历记 / 东德末任军职国防部长的回忆

最后一道命令

〔德〕特奥多尔·霍夫曼 / 著



海南出版社

最后一道命令

[德]特奥多尔·霍夫曼 / 著
王建政 邢奇志 刘琪宝 郭爱玲 / 译



Das Letzte Kommando: Ein Minister erinnert sich

by Theodor Hoffmann

Copyright © 1993 by Verlag E.S.Mittler & Sohn GmbH, Herfor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1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Verlag E.S.Mittler & Sohn GmbH, Herford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1-5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道命令 / (德) 霍夫曼 (Hoffman, T.) 著;

王建政 等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6

书名原文: Das Letzte Kommando: Ein Minister erinnert sich

ISBN 7-5443-0114-1

I. 最... II. ①霍... ②E... III. 纪实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1644 号

最后一道命令

作者: (德) 特奥多尔·霍夫曼

译者: 王建政 邢奇志 刘琪宝 郭爱玲

责任编辑: 朱 晓 汤万星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忠诚诚印刷

出版日期: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8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0114-1/E · 1

定价: 29.80 元

东德剧变第一见证人证词 / 两德统一最后发令者手记

东德剧变亲历记 / 东德末任军职国防部长的回忆

Therese Hoffmann





前 言

自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以来，已经过去四年；自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重新实现国家统一以来，则已时过三年了。这两个历史性日子之间的这一年，是东德及其国家人民军存世的最后一年。在此期间，我本人则正处于两支德国军队之间的最高层——自 1989 年 11 月 18 日起，任莫德罗政府的国防部长；自 1990 年 3 月 18 日人民议院大选后，任德梅其埃政府裁军与防务部国家人民军总司令。

对东德和本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和欧洲政治体制发生着变化。其中某些过程，我有过亲历；其他一些过程，我则得以在近距离上亲睹。

本书后续几章中，我将以亲身经历描述东德武装力量在其生存之最后阶段的局势发展。在作此斗胆尝试时，我完全意识到此举的艰巨性。

尽管我试图努力写出当年对时局的看法，但是今日的认识与昔日的印象交相混杂，其评价虽然堪称冷静之思维，却难免受到情绪之影响，即使在刻意力求客观评价的前提下，仍会流露个人的好恶。

我出生于一个农业工人家庭，在维斯马附近一个小村庄里长大。自小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在这第二个德国内。这个国家是在 1949 年因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要求而成立的，





它为劳动阶层带来了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尤为重要的是，它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意在从它的领土上根除战争思想、种族狂想和鼓噪民众的所有根源。

纳粹统治给德国和欧洲各民族带来过严重后果，我由此看出达成上述目标的特殊重要性，深感这些目标值得矢志追求。因此，我认为保卫民主德国及其公民乃是合法行为，遂于1952年5月自愿报名参加人民警察。我自1953年起进入驻营人民警察部队海上军官学校，1955年10月被任命为海军准尉，1956年成为统一社会党预备党员。

在1960年之前，我担任过各种舰上职务，主要是在各型快艇上——二副，艇长，某运输艇中队队长。之后，我前往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在苏联海军学院学习至1963年。此后十年，及至1974年，我是在人民海军各型导弹快艇上度过的，先后担任过某导弹快艇大队参谋长和司令、第6分舰队（驻地为德兰斯克）参谋长和司令。1987年前，我在人民海军司令部（驻地为罗斯托克的盖尔斯多夫）先后任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我于1987年3月1日晋为海军中将，1987年12月1日被任命为人民海军司令。

这一条道路，在1935年时对我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当时，我所憧憬的职业不过是农庄工人或马倌。但是，对一位就学于梅克伦堡乡村学校、因战争而荒废许多学业的毕业生来说，即使在经过农业管理的专业学习之后走上了行武道路，此路亦无坦途。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水兵走上了将军的阶梯，没有踩漏过一脚，在某些阶层上也曾驻足过相当长的岁月——所幸均是在和平时期。

1990年9月，我在被辞离国家人民军后立即作出决定，要写一些回忆文章，把我在军中服役的时代和与我有关的人物





记录下来。之所以作此决定，主因是想完成某种道德上的义务。鉴于有关国家人民军的介绍与评价颇多偏见和诋毁，我愿从一个在这支军队中服役几达 40 年，并有一年位居顶尖的老兵的视角，如实介绍军中的生活，介绍军职与文职军人乃至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介绍国家人民军与华沙条约其他国家军队之间、与民主德国各政党及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我在与前国家人民军军人、在与联邦国防军的军官和将军们的谈话中发现，对许多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存在着极为不同的观点。因此，我的描述肯定会引起种种批评。批评者中，既会有那些认为我观察问题只能从“海军的视角”，因而他们对国家人民军的了解更甚于我者；也会有那些对民主德国曾经有过的、与联邦德国有所不同的一切均持批评态度者。

我本意并不想“美化”国家人民军。我也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凡是在民主德国承担过责任的每一个人，必须允许别人提出问题或表达好恶，允许别人对自己所作的贡献或所犯的失误评头品足，无论其结果是达到还是错失了国家的初始目标。我们军方领导层的每一个人，作为承担国家重任之政党的党员或官员，确实应对民主德国各种领导力量未能具备足够的远见和创造力，因而未能适应经济、科技与政治现实的情况分担一定的责任。

我相信，只有彻底弄清各种原因，才能有助于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诸多原因中，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与自由，从而使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使整个社会逐渐趋于瘫痪。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甚至于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在火药





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一场景发生于 1989 年夏秋之际。其时，东德群众外逃浪潮四起，数万人为争取社会变革而和平示威。

有一点在我看来同样重要，即对随之而来的两德统一进行研究，从而使如今生活在一个国度内的人民，能够获得设计未来所需要的知识。尽管经济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好转，但是许多前东德公民却受到了刚刚避开雨淋、又遭檐水洗劫的背运。大量失业、社会动荡和刑事犯罪等现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如果说以往国家对公民的监护常常呵护过度，那么今天他们却时时有被人遗弃之感，只能独自面对各种问题。

有一点确是事实：东德相当一批知识界人士感到自己遭到了“清算”、剥夺了权利、受到了鄙视，统一之前的各种许诺均未兑现。在满怀希望却蒙受欺骗的人群中，也包括许多武装力量的成员。前国家人民军的某些军官们扪心自问，抑或相互发问：“难道我们在转折之前和转折之后都只能听天由命？难道我们不可以约定时间大胆地走上街头，为争取我们东德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我们这些用当今语言来说属于‘公共事务’人员的合法权益而齐声呐喊？”

在谈及 1989 年 10 月之后数月的事态，我一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支持东德的转折和社会变革，确保这一变革的和平进程，乃是正确之举。它符合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所遵循的方针，即并非向任何政党，而是向最高人民代表机构负责，向民选政府负责——不仅对莫德罗内阁，而且也对德梅齐埃联合政府无条件地表现出忠诚。同样正确的是：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立即统一时，绝对应当有意识地走上德国统一的道路，并提出自己对此的设想和建议。

这样做之所以正确，其理由十分简单：军队不可能也不愿





意违背人民的意愿。东德武装力量的成员均对“国家人民军”的称谓十分珍视。数十年来，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是在以完成其军事任务的方式为人民服务，具体而言就是保卫东德外部边界的安全、维护中欧的和平现状。社会内部体制的转变，本不是人民军的任务；军队也不应是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付内部矛盾、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当这一机构开始转轨时，人民军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适应这些变化。当统一进程开始后，人民军必须努力参与这一进程。

当然，我们在作此考虑时是基于两个平等权利的国家 and 军队。如果事态发展并非如此，早在 1990 年初就会出现裂痕。然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当时忽视了某些“明摆着的迹象”。

撇开这些因素不谈，我认为德国统一（即使是以“加入”的方式）的进程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为我国人民创造和平之未来提供了现实的机遇。冷战结束之后，我像许多前东德公民一样，期待着与中东欧其他各国人民之间也能发展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一个更加强大的新德国，理应施加其影响，使事态向这一方向发展。在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度内，前东德的军人乃至全体公民，既不应袖手旁观，亦不应被打入另册。

特奥多尔·霍夫曼
退役海军上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转折期间的国家人民军	1
第二章 出任国防部长	32
第三章 军事改革开始起步	58
第四章 统一社会党及其权力机构的崩溃	86
第五章 危机中的国家人民军	107
第六章 军事改革初见成效	142
第七章 德国统一的轨迹	176
第八章 在圆桌会议上	207
第九章 部长卸任	229
第十章 谁将当部长	264
第十一章 国家人民军将何去何从	286
第十二章 北约还是华约	314
第十三章 解体	344
第十四章 告别	383
附 件	409



1989年10月4日晚，国家人民军庆祝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阅兵式总彩排在柏林举行。尽管我作为海军司令负责指挥罗斯托克的舰队阅兵式，但身为国防部副部长，我又不得不参加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总彩排。

我刚刚抵达柏林，就被部长凯斯勒大将用一辆指挥车接走了。已经到达会场的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兼各总部、各军种和边防军的领导——布吕纳上将、戈尔德巴赫上将、格雷茨中将、施特希巴特上将和鲍姆加尔滕上将。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上将由施特格尔中将代表，空军/防空军司令赖因霍尔德上将由贝格尔中将代表。





部长通报说，德累斯顿出现了极为严峻的局面。数千人（大多是年轻人）试图冲进火车总站，目的是挤上从布拉格经德累斯顿开往西德的火车。这列火车的任务是运载那些逃进西德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东德公民。部长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应当派出军队支持警察警戒车站地带？

总彩排结束后，我们再度坐进指挥车。部长在经过简短会议后作出决定，下令让第3军区（驻地为莱比锡）进入“高级战备状态”，并通知军事学院的非建制分队、第7坦克师以及位于德累斯顿军区的各所军官学校。其任务是支援警察警戒重要目标。不得使用任何射击武器。因此，在确定提高战备状态时下发的各种武器，又于10月6日奉凯斯勒大将之命重新收回。

正在柏林参加阅兵式总彩排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军事学院院长格默特中将，受命确保与德累斯顿专区人民警察局行动指挥部的协同动作。他于当夜乘机飞回德累斯顿，同行的还有人民军总政治部的高级军官科柯特少将。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种种可能性：在庆祝东德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尤其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柏林勃兰登堡门一带，是否会出现大规模冲击边界的行动？是否会出现反对阅兵部队的示威活动？是否会发生冲击人民军装备的行动？在匈牙利边界于9月间开放之后，东德的政治危机急剧恶化。发生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事件，对东德来说十分丢面子。在沉默数周之后，东德党和国家领导层作出了目光短浅的反应，此举甚至许多党员中间也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愤怒。

部长下达任务，要求加强对军事目标以及武器弹药的保卫工作。令人惊讶的是，此外我还得到了指示，要求第6海岸防卫旅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在未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我居





然会得到这样的专业性指示，此举绝非寻常。何况，几周以来早已没有人企图从海上边界离开东德。

在乘车驶回罗斯托克途中，我暗自思考个中原因。我决定违抗命令，不要求第6海岸防卫旅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从军事和政治局势角度看，这样做毫无必要性，反而会在群众中引发更加强烈的骚乱。

此时此刻，我更担心的是罗斯托克舰队阅兵式的安全问题。为参加这次国庆四十周年庆典，苏联和波兰军舰将专程来访，人民海军的舰艇则从各港驶来。

当我回到罗斯托克时，夜生活早已结束，整个城市已经陷入沉睡，我的紧张情绪也平息下来。我与第6海岸防卫旅旅长通了电话，向他传达上级的指示，并解释了我为何作出与此命令相悖的决定。他同意我对局势的判断，建议暂时不要采取任何特别措施。我们准备第二天会商一下，是否有必要加强乌泽多姆岛的边防警戒力量，因为自夏天度假季节以来，东德公民由此越境前往波兰的现象有所增加。

果然不出所料，代理总长施特格尔中将于10月5日打来电话，嘱我报告边防旅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执行情况。我向他解释了未执行这一指示的理由。原因之一，这一战备状态意味着要进行战争动员，要将边防舰艇移交各区舰队，而这一切显然不是下达指示的领导人的原本目的。施特格尔中将当即声明，同意我的决定和考虑。

当天，兄弟国家的波罗的海舰队各编队驶抵罗斯托克的瓦尔内明德港。我为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和波兰海军舰队司令举行了欢迎仪式。10月6日，当我同两位海军上将拜访东德国防部长时，均未提及近几周乃至近几日发生的高度爆炸性事态。波兰方面也对这些事态负有直接责任——西德驻华沙大使





馆也接纳了数百名企图外逃的东德公民。

有关德累斯顿、莱比锡以及其他中心城市公民示威的事态发展，人民海军领导层根本得不到正式的通报。当我晚间从电视中见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火炬游行盛况和人群中的激动情绪——主要是欢呼戈尔巴乔夫，心中反而平静了几分。埃里希·昂纳克在庆典演讲中居然未对国内存在的现实问题作出丝毫分析，仍然试图向全世界展现一个美满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象，此举当然不仅引起了我个人，也包括我的部属和家人的不满。他的演讲无异于东德中央控制的所有大众媒介中的男高音独唱。

1989年10月7日，群众踊跃参观了舰队，包括军营、训练设施、作战舰艇和舰队阅兵式。这是一次“站立式阅兵”，也就是说，各型舰艇统统停靠码头、抛锚泊位。作为“检阅官”，我乘坐一艘鱼雷快艇在舰艇编队前驶过。紧接着开始表演节目。武装泅渡者从高速行驶的小型鱼雷快艇上跃入水中，还有一些蛙人从直升机上操纵滑翔伞落在水面上。所有参演者和参观者大概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人民海军乃至全东德的最后一次舰队阅兵仪式。

在柏林，当人民军和边防军的仪仗队列队走过检阅台时，观摩者肯定会油然而生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钢盔底下，军官、军校生、准尉、士官和士兵们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真的是那种“红色普鲁士人”？他们真的会拥有意愿和能力，“无条件地”执行“工农政权”发布的每一道命令？人民军内的真正局势究竟如何？政治危机和不断升级的群众骚乱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军队产生影响？武装力量究竟将面对何种额外的特殊问题？

早在1988年10月，内部有关“情绪和意见构成情况”的





各种分析报告就向最高军队领导表明，东德目前被视为十分糟糕的局势应归咎于中央领导机关的失误和失灵。由于商业和服务行业供不应求的现象日益严重和明显，即使在军官圈内也引发了对统一社会党主导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人们对住房建设计划中提出的“主要任务”，即“目标明确地实现生产现代化，以提高群众的物资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可行性也产生了怀疑。

国家安全部曾向米尔克和凯斯勒两位部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为各种武装力量制定“2000年管理规划”。这份报告在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领导才能进行评价时，批评的尖锐程度进一步增强。在讨论中，人们把主要原因说成是年事过高，因而自然难以适应过于复杂的要求。此外，报告还认为，领导干部因为拥有特权而对日常供应问题缺乏了解。在群众传播政治意义消极的笑话时，居然有越来越多的“好同志”参与。影射的含义越来越有针对性，人们对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几乎毫不怀疑。两位部长了解的这些情况，均属于“高度机密”。

在边防部队内，人们也把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背离家乡的关键原因归咎于统一社会党的经济、新闻和信息政策的失误。1988年12月初，东德国防部长得到报告：仅在10月和11月间，边防部队即有98名军人从直接警戒边界的岗位调去后勤分队，原因是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可靠性值得怀疑。1988年度，“调离前线”——直接警戒边界勤务——的总人数因而达到422人。

东德边界警戒措施，尤其是边防勤务中使用射击武器的做法，成为西德和东德大众媒介的报道焦点。《时代》周报刊登了一篇采访凯斯勒大将的文章，此文也被《新德意志报》全文转载。有关“射击命令”是否存在的说法颇多争议。他在文中



说，只有“在边界受到武装冲击时”和“受国家委托保卫边界者遭遇攻击时”，方可使用射击武器。尽管这一讲话含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当时被视为边界警戒制度将趋于自由化的信号。

绝大多数东德公民和军人对 80 年代的缓和政策、对话诚意、裁减军备与军备控制措施持赞同态度。当苏联政治家和军方力主华约通过在东德增加部署导弹的决议，以反击北约关于增加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时，昂纳克公开声称“现在才是与波恩及其北约伙伴继续对话的时刻”，不愿导致新的冰冻期。

这一举动，在昂纳克 1987 年 9 月对西德的国事访问期间也受到了西德政界名流的高度评价。我始终关注着这次访问及其反应。《新德意志报》不仅不加评论地全文刊登了昂纳克的讲话，也刊载了西德联邦总理及其他政治家的公开演讲，包括对保障人权和迁徙自由的所有警告。

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都把这次国事访问视为两德关系的真正新开端。我们甚至希望很快就能与西德联邦海军军官开展近于正常的接触，如同我们与瑞典、芬兰和其他资本主义海军已有的关系。

1989 年 1 月 23 日，昂纳克在欢迎瑞典总理卡尔松的一次宴会上出人意料地宣布，东德国家人民军将在 1990 年年底前单方面裁军 10000 人，削减国防支出 10%，并将在 1990 年底前使人民军体制更加具有严格的防御特点，而这一切措施完全不取决于谈判的结果。他的讲话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好感，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这一决定是否有财政背景，当时还看得不大清楚。然而，此举旨在政治得分，试图使东德在裁军方面扮演领头羊角色，这一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在昂纳克这一声明发表之前，戈尔巴乔夫早于 1988 年 12

